

---

# 如何提升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

## ——基于贵州贫困村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王华书<sup>1</sup>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户发展能力,使其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在产业扶贫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发现一些扶贫项目增收效果不佳,商品化、市场化率水平低,未能形成贫困农户稳定的收入源。如何有效提升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值得深入探讨。以实现产业扶贫项目落地为目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不同类型贫困村 208 户农户调研数据为支撑,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与研究,运用 Logit 回归模型,对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增收的概率及对产业扶贫的满意度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增收效果不佳,农户满意度不高。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应减少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对贫困户的能力进行精确识别;大力发展合作社;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

**【关键词】**:产业扶贫 项目 效果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9-128-135

### 一、引言

产业扶贫通过鼓励、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方式。立足于地区资源环境特点及优势,紧密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力推广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有助于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提高精准扶贫质效。但是由于贫困户在生产技术、组织管理及市场销售等方面能力欠缺,抵御自然风险及市场风险能力弱,以及一些参与式扶贫项目并不完全反映贫困户实际需求,这些因素导致贫困户扶贫项目满意度偏低、退出率高,增收效果不尽理想。张琦等在《2013 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域检测报告》中,利用 2012 年全国特困地区 680 个县级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扶贫在惠及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程度亟待提高。此外,由于缺乏对扶贫项目影响因素、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口满意度等考评,难以准确判断产业扶贫效果及提升路径。

产业扶贫是解决贫困地区生产与发展问题的根本手段,在目前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全国各地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看,大多数省份 70%左右的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sup>[1]</sup>但是,各类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不尽相同,一些扶贫项目商品化、市场化水平低,未能形成稳定收入源,导致增收效果不佳、贫困农户满意度偏低等问题。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什么类型的产业扶贫项目更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呢?回答这些问题对破解目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困境,提升扶贫后期产业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

<sup>1</sup>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与产业组织优化研究”(71963006)。

作者简介:王华书,博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发展经济。

黔东南州作为贵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市州，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扶贫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地区脱贫攻坚以及脱贫后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通过对四个不同类型贫困村 208 户农户的调研发现，在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户对不同扶贫项目的执行情况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项目的满意度也不尽相同。基于此，本文从产业扶贫项目满意度与增收效果两个角度构建了 Logit 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显著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产业扶贫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成果，现有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类是产业扶贫的模式研究。国内的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扶贫模式，主要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多方参与治理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复合治理模式等。<sup>[2][3][4]</sup> 第二类是产业扶贫面临的困境分析。许汉泽等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sup>[5]</sup> 陈希勇认为，产业精准扶贫存在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不准、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不准等问题。<sup>[6]</sup> 邓维杰等则强调，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面临重旅游业发展轻扶贫成效、精准扶贫空壳化等问题。<sup>[7]</sup> 第三类是产业扶贫的效果评估与绩效评价。熊正贤认为目前武陵山区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处于倒“U”字型曲线的上升阶段。<sup>[8]</sup> 王立剑等则强调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sup>[9]</sup> 第四类是产业扶贫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修兴高提出基层组织能力禀赋、地区资源禀赋、行业属性、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利益联结机制是产业扶贫模式取得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sup>[10]</sup>

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产业扶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但利用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多数是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且现有研究多忽略了扶贫项目的性质及其可能对扶贫效果产生的影响，也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内在原因。基于以上几点，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贫困村数据为基础，尝试从竞争性与排他性的角度明确产业扶贫项目的性质，对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扶贫政策效果。

## 三、研究假说

保罗·萨缪尔森最先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sup>[11]</sup>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虽然黔东南州几乎所有的产业扶贫项目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本质并非完全相同。与能繁母牛项目、蓝莓种植项目、黄花种植项目相比，稻田养鱼项目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农户只要种植水稻，将政府发放鱼苗放入稻田即可，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和资源支撑，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由于参与门槛低，这一类型的项目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但绝大部分产出都用于农户自给，并未参与市场交换。这意味着，这一本应激励农户生产，促进其增收的产业扶贫政策沦为了政府免费提供的公众“福利”，除了短暂的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外，并不能起到实质上的“扶贫”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稻田养鱼”项目作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的代表，提出如下观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以“稻田养鱼”项目为例)增收效果不佳。

农户是产业扶贫的主体，户主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其个体特征可能会对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年龄越小的农民，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接受能力越强，扶贫效果越好。<sup>[12]</sup> 男性比女性有更充沛的体力，且更不容易被家庭琐事分担精力，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产业扶贫效果可能更好。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具有“重消费不重积累”、对市场信息和数字不敏感的生计文化特征。<sup>[13]</sup> 可能影响其生产行为的市场化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年龄、性别、民族 3 个变量来反映农户的个体特征，并提出以下观点：个人特征会影响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其中：年长的少数民族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增收的概率降低，男性(与女性相比)增收的概率会增加。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sup>[14]</sup> 因此，除个体特征之外，农户资源禀赋差异也是影响产业扶贫实施效果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从事生产的能力越强，产

业扶贫效果可能越好。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增收的概率就越高。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比其他农户拥有更多的人脉和信息优势，可能会提高增收的概率。非贫困村在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于贫困村，扶贫效果应当更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政府对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有明显的政策倾斜，因此，难以预判贫困程度对增收的影响。致贫原因的不同也可能使扶贫效果产生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教育程度、劳动人数、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是否贫困户、村别、致贫原因等 7 个变量来体现农户的资源禀赋，并提出如下观点：农户资源禀赋能够影响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其中：教育程度高、劳动人数多、人均耕地面积大、并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非贫困村农户增收的概率会提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增收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不同的致贫原因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但方向无法判断。

产业组织模式也可能会对贫困户的增收起到促进作用。结合调研情况来看，黔东南以“合作社+农户”模式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制度安排天然地具有益贫性的组织特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理想载体。<sup>[15]</sup>张晋华等实证分析了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纯收入增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sup>[16]</sup>因此，本文选取“是否参加合作社”这一变量来分析产业组织模式的作用，并提出如下观点：参加合作社对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有正向影响。

## 四、实证分析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研究数据均来自 2016 年课题组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实地调研。笔者从麻江县、雷山县、丹寨县按照贫困深度不同随机选取了一个刚出列的普通村 BJ 村，两个一般贫困村 JG 村、ZL 村，和一个深度贫困村 YY 村共四个样本村。对上述样本村全部尚未脱贫贫困户，以及按 10%比例随机抽取的建档立卡脱贫户(曾经是贫困户，但在调查年份已脱贫)，共计 241 户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采用结构化访谈问卷的形式，共设计了 26 个结构化问题，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受访者基本情况，二是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情况，三是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情况。根据研究需要剔除缺漏值和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208 份，样本有效率为 86.31%。其中，BJ 村 83 份，ZL 村 71 份，YY 村 14 份，JG 村 40 份。

### (二)模型选取与变量设定

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可以通过项目是否促进增收来直观的反映。但增收体现的是短期的成效，无法反映长期变化。同时，即使农户普遍实现增收，但增收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农户心理的不平衡，不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故而本文选取“农户增收情况”这一客观标准和“农户的满意程度”这一主观标准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助于对项目的实施效果做出综合评价。

首先，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此时利用二元选择模型，对增收效果及满意程度进行分析。令增收=1，无增收=0，模型形式如下：

$$\text{logit}\left(\frac{P}{1-p}\right) = \alpha_1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k x_k \quad (1)$$

其次，利用 Mlogit 模型构造产业扶贫项目满意程度模型，令一般=0，较满意=1，非常满意=2，将较满意组和非常满意组分别与一般组相比。方程形式如下：

$$\text{logit}\left(\frac{p_i}{p_j}\right) = \alpha_1 + \beta_1 x_1 + \cdots + \beta_k x_k \quad (2)$$

### (三) 变量及样本数据描述

基于前期学者的研究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形式、项目特点四个维度作为解释变量。具体指标如下：

表 1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设置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增收情况	增收=1 不增收=0	208	0.58	0.494	0	1
满意程度	一般=0	206	0.31	0.464	0	1
	较满意=1		0.58	0.494	0	1
	非常满意=2		0.11	0.310	0	1
村别	JG 村=1 其他=0	208	0.19	0.391	0	1
	YY 村=1 其他=0		0.09	0.289	0	1
	ZL 村=1 其他=0		0.34	0.475	0	1
性别	男=1 女=0	208	0.90	0.296	0	1
年龄	实际观测值	208	52.23	13.808	13	83
民族	少数民族=1 汉族=0	208	0.97	0.168	0	1
贫困程度	贫困户=1 非贫困户=0	208	0.87	0.342	0	1
致贫原因	因学致贫=1 其他=0	208	0.13	0.337	0	1
	因缺乏资金致贫=1 其他=0		0.13	0.332	0	1
	因缺乏技术致贫=1 其他=0		0.17	0.379	0	1
	因病致贫=1 其他=0		0.25	0.437	0	1
教育程度	小学=1 其他=0	208	0.69	0.462	0	1
	初中=1 其他=0		0.23	0.419	0	1
	高中及以上=1 其他=0		0.04	0.204	0	1
劳动人数	实际观测值	208	2.43	1.268	0	5
人均耕地面积	实际观测值	208	0.95	0.757	0.17	7
社会资本（村组干）	有=1 否=0	208	0.10	0.396	0	1
合作社	参加=1 未参加=0	208	0.55	0.498	0	1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参加=1 未参加=0	208	0.84	0.371	0	1

由表 1 可知，调查样本以男性居多，占 90%，平均年龄 52 岁，少数民族占总样本的 97%，87% 的农户为贫困户，致贫原因较为平均，因病致贫人数稍高，每户平均拥有 2.43 个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 0.95 亩，约有 10% 的农户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近 70% 的农户仅有小学学历。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不高，但在调研人员与翻译人员的帮助下，被调查者基本上都能正确理解问卷内容并给予回答，调查数据质量较高。

### (四) 模型估计结果

### 1.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增收情况)。

模型拟合前，笔者检验了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检验值均低于10的阈值，证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在平均水平条件下，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增收概率达到65.2%。可见政府产业扶贫项目确实对贫困农户增收发挥了效果，但对不同贫困农户的作用效果显著不同。

首先，农户个人特征的影响。少数民族比汉族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增收概率提高53%，统计显著性达到1%。这与贵州省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不无关系。近年来颁布实施的《贵州省大扶贫条例》、《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一系列政策，均强调了各级政府应当对少数民族扶贫对象进行重点帮扶，优先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其次，农户资源禀赋的影响。教育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影响显著为正，与预期方向一致。随着项目户文化程度的提升，增收情况逐级递进。与文盲相比，小学教育程度农户增收概率提高50%，初中教育程度农户增收概率提高42%，高中及以上教育增收概率提高33%，说明学历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项目的落实情况，高学历农户能从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与非贫困村BJ村相比，JG村、YY村、ZL村的样本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增收概率分别会下降30%、34%和28%。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的增收概率下降36%。说明尽管政府对贫困户有明显的政策倾斜，但贫困户由于自身禀赋的限制，依然无法弥补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而非贫困户凭借能力与信息优势，比贫困户能更多地从产业扶贫中获益，可能产生“精英捕获”现象。与因缺乏劳动力致贫的农户相比，因病致贫的农户增收概率会提高21%。这可能是由于因病致贫的农户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做出生产决策，而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替他们做出了决策并提供了销售渠道。人均耕地面积变量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符合预期假设，边际影响为0.14。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增收效果提高14%。

第三，产业组织及项目性质的影响。分析“合作社+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发现，参加合作社的项目户比未参加合作社的项目户增收概率要提高28%，与预期方向相同。说明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贫困户能够合作互助，共享政策红利，共谋发展。

第四，产业扶贫项目性质的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对农户增收显著为负，增收概率下降37.6%，与预期方向一致。说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对农户增收意义不大，非排他性使得该类项目更多的展现出公益性质，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即无法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又容易出现参与人数众多干扰市场价格的现象，扩大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风险。同时，农户还有可能被该项目被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其他生产活动，导致整体增收效果下降。

表2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增收情况)

变量名	系数	边际影响
调查村(参照组:BJ村)		
JG	-1.26(0.799)	-0.30(0.186)
YY	-1.44*(0.858)	-0.34*(0.191)
ZL	-1.18*(0.626)	-0.28*(0.141)
性别	0.88(0.589)	0.21(0.145)
年龄	0.001(0.013)	0.0003(0.003)
民族	2.54*** (0.936)	0.53*** (0.120)
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小学	2.19*(1-315)	0.50*(0.255)
初中	2.52*(1-321)	0.42*** (0.141)
高中及以上	2.54(1.549)	0.33*** (0.088)

贫困户	-2.39** (0.978)	-0.36*** (0.080)
劳动力人数	0.05 (0.186)	0.01 (0.042)
人均耕地面积	0.62** (0.300)	0.14** (0.067)
社会资本 (村组干)	1.11 (0.873)	0.21 (0.129)
参加合作社	1.26** (0.509)	0.28*** (0.108)
致贫原因 (参照组:因缺乏劳动力致贫) 因病致贫	1.11* (0.642)	0.21** (0.097)
因学致贫	0.55 (0.682)	0.11 (0.131)
因缺乏资金致贫	0.13 (0.561)	0.03 (0.124)
因缺乏技术致贫	0.70 (0.547)	0.15 (0.108)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2.41*** (0.851)	-0.38*** (0.071)
常数项	-1.97 (1.926)	
样本数	208	
Waldchi2(20)	40.76	
Prob>chi2	0.003	
虚拟R平方	0.25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差。回归模型边际影响(有无增收效果): $y=Pr(\text{inperform3inpro}) (\text{predict})=0.65169863$

## 2. Mlogit 模型回归结果(满意度)

首先, 农户个人特征的影响。男性比女性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减少 8%, 统计显著性为 5%。这可能是由于与女性相比, 男性的收入负担更重, 在生产上也投入了更多精力, 对项目成效的要求也更高。年龄对满意度的影响并非十分显著, 统计显著性为 10%, 年纪较长者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仅减少 0.4%, 说明年龄不是影响农户满意度的主要变量。民族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显著, 少数民族比汉族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 55%, 统计显著性为 5%。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提高 93%, 统计显著性为 1%。这说明, 少数民族政策效果凸显, 农户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带来的好处, 提高了满意度。

其次, 农户资源禀赋的影响。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户的满意度, 与文盲相比, 小学教育程度的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 47%; 初中教育程度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 53%; 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 47%, 上述结论均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学历农户比低学历农户更有能力从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但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户满意程度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比文盲降低 102%, 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已有的产业扶贫项目虽然可以有效促进增收, 但仍不足以满足较高学历人群的需要, 或者是由于项目本身与农户个人能力不匹配造成的。ZL 村农户的满意度明显低于 BJ 村, 调查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提升 24%, 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减少 93%, 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反映出该村产业扶贫的整体情况较差。在调研中, 调查组发现该村开展的一些项目并未实现增收, 原因在于农户技术培训不到位, 产量低, 机会成本高, 村民对村干部存在不信任与不满情绪。家庭成员中有村组干的农户满意程度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下降 95%, 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是这类农户对增收有较高的期望值, 而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这一优势并未带来额外的收益, 导致农户满意度下降。

第三, 产业组织及项目性质的影响。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显示, 参加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户的满意程度, 该变量通过了 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降低 15%。说明农户基本认同合作社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第四, 产业扶贫项目性质的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使得农户的满意度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提升 25%, 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该项目并没有被农户所认可。结合该项目对增收的负向影响，符合预期假设。

表 3 多分类逻辑模型 (MLOGIT) 回归结果 (满意度)

变量名	较满意组与一般组比较		非常满意组与较满意组比较	
	系数	边际影响	系数	边际影响
村庄名 (参照组:BJ 村)				
JG	-1.51 (1.071)	-0.27* (0.153)	2.37 (2.047)	0.17 (0.112)
YY	0.95 (0.851)	0.14 (0.129)	0.45 (2.130)	0.01 (0.127)
ZL	0.10 (0.547)	0.24** (0.107)	-15.32*** (1.051)	-0.93*** (0.211)
性别	-0.96 (0.789)	-0.13 (0.116)	-1.50** (0.745)	-0.08** (0.035)
年龄	-0.02* (0.015)	-0.004** (0.002)	0.009 (0.022)	0.001 (0.001)
民族	-2.17** (0.927)	-0.55*** (0.157)	14.76*** (1.243)	0.93*** (0.202)
教育程度 (参照组:文盲)				
小学	-3.16*** (0.981)	-0.47*** (0.138)	-1.64 (1.393)	-0.05 (0.077)
初中	-3.58*** (1.048)	-0.53*** (0.151)	-1.85 (1.323)	-0.06 (0.073)
高中及以上	-4.71*** (1.359)	-0.47** (0.214)	-17.80*** (2.070)	-1.02*** (0.190)
贫困户	-0.93 (0.735)	-0.13 (0.111)	-1.34 (1.755)	-0.07 (0.100)
劳动力人数	-0.24 (0.185)	-0.03 (0.028)	-0.33 (0.422)	-0.02 (0.025)
人均耕地面积	-0.37 (0.265)	-0.06 (0.040)	0.01 (0.307)	0.01 (0.018)
社会资本 (村组干)	0.04 (0.651)	0.23* (0.139)	-15.66*** (1.196)	-0.95*** (0.172)
参加合作社 致贫原因 (参照组: 因缺乏劳 动力致贫)	-1.08** (0.452)	-0.15** (0.065)	-1.24 (1.446)	-0.06 (0.086)
因病致贫	0.36 (0.675)	0.06 (0.102)	-0.003 (1.090)	-0.005 (0.065)
因学致贫	0.45 (0.738)	0.04 (0.114)	2.07 (1.616)	0.12 (0.088)
因缺乏资金致贫	-1.41 (0.697)	-0.22** (0.107)	-0.04 (0.931)	0.02 (0.057)

因缺乏技术致贫	0.07 (0.667)	-0.007 (0.103)	1.22 (1.121)	0.07 (0.065)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1.67*** (0.586)	0.25*** (0.084)	0.83 (1.060)	0.03 (0.064)
常数项	7.88*** (2.032)		-13.18*** (2.922)	
样本数	206			
Waldchi2(20)	4440.49			
Prob>chi2	0			
虚拟R平方	0.3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差。

## 五、结论与对策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原动力,是实现 2020 年农村人口全面脱贫的根本途径。产业扶贫效果直接影响全面脱贫任务能否如期实现。本文以实现产业扶贫项目落地为目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典型村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与研究,运用 Logit 回归模型,对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增收的概率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模式和项目性质的影响。非贫困村农户增收概率更高,少数民族比汉族增收概率更高;参加合作社更有利于增收;与贫困户相比,非贫困户通过产业扶贫增收的可能性更高,因病致贫的农户比其他贫困户更有可能增收;而教育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增收均有正向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有负向影响。

其次,农户对产业扶贫的满意程度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模式和项目特点的影响。非贫困村农户的满意度高于贫困村,男性的满意度低于女性,少数民族对产业扶贫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汉族;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满意度呈递增趋势,但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户满意程度从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又显著降低;与没有社会资本的农户相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反而降低满意度;参加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户满意度,参加“稻田养鱼”项目会降低满意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减少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农民是有限理性的,他们对短期内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强度,却往往忽视地区经济和自身的长远发展。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虽然能够短暂的满足日常消费需求,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源。在未来,一旦这种无差别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可能迅速拉低市场价格,不仅不能为农户提供长期的、稳定的收入,还可能扩大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风险。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来说,政府的财力极其匮乏,应当将有限的资源最有效率地利用,因此,应当减少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

其次,对贫困户的能力进行精确识别,丰富产业扶贫项目种类。目前的产业扶贫项目未能与贫困户的个人能力进行精准匹配,且已有的项目并不能满足较高学历人群的需要。公益性的产业扶贫项目虽对农户增收意义不大,但可以借此识别贫困户的能力。对于自身能力较强的贫困户,应当给予其匹配的资源 and 项目恰当地弥补其缺陷,使产业更具竞争性,提高市场化率水平。

第三,大力发展合作社等农村产业组织建设。鼓励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弱者的联合”。同时,支持一定数量的非

---

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以“能人带动”的形式帮助贫困户脱贫。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BJ村允许30%的非贫困户加入合作社，而其他三个贫困村只允许贫困户加入，挫伤了其他农户的积极性，无法发挥非贫困户的示范作用，阻碍了知识溢出。因此，各地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能人加入合作社，既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激励贫困户脱贫，又能扩大合作社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分散风险。

第四，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户都仅有小学教育水平，自身发展意识薄弱，对政策的依赖性较高，对数字和市场缺乏敏锐度。因此，应当重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尤其应当重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升贫困户劳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同时，强化发展意识，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第五，加强区域内土地流转，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应当重视对长期外出户及易地扶贫搬迁户土地的流转利用，整合碎片化土地，更有利于招商引资和扩大产业规模。交易渠道方面，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土地流转的线上交易，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拓宽农户信息交流的渠道，创新交易方式，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土地流转效率。

本文对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四个典型村的截面数据，结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及局限性。未来课题组将通过扩大研究地域及样本数量，并定期回访样本农户，以长期观察政府各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为政府决策提供更科学、可靠建议与指导。

#### 参考文献：

[1] 李博，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4):66—73+190.

[2] 覃建雄，张培，陈兴. 旅游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4(7):134—138.

[3] 李志萌，张宜红. 革命老区产业扶贫模式、存在问题及破解路径——以赣南老区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36(7):61—67.

[4] 白丽，赵邦宏. 产业化扶贫模式选择与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河北省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为例[J]. 河北学刊, 2015, 35(4):158—162.

[5] 许汉泽，李小云.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9—16.

[6] 陈希勇. 山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来自四川省平武县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6(5):87—90.

[7] 邓维杰，何海燕，朱淑婷.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J]. 农村经济, 2017(12):44—49.

[8] 熊正贤. 特色文化产业扶贫的特征分析与绩效问题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4(4):108—115.

[9] 王立剑，叶小刚，陈杰.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13—123.

---

[10] 修兴高. 产业扶贫模式:运行成效、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福建省产业扶贫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4):188—194.

[11] Samuelson, Paul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4):387—389.

[12] 顾颖. 苍溪县猕猴桃产业扶贫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D]. 四川农业大学, 2017.

[13] 汪三贵, 张雁, 杨龙, 梁晓敏.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 [J]. 中州学刊, 2015(3):68—72.

[14] (印)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任颢,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85—89.

[15] 吴彬, 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 [J]. 农村经济, 2009(3):115—117.

[16] 张晋华, 冯开文, 黄英伟.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绩效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9):4—12.